

# 象牙塔中的应用之惑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安徽省某高校新闻系教师王焯最近遇见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原来,该校正在搞应用性本科转型建设。可是对于该怎么搞,大家一片茫然。

“学校安排全体教师开展了两次大讨论,但是讨论会上的主要内容不是讨论,而是宣读文件,并让每人会后交一份2000字的心得报告。我们不会写,只能去网上抄,还被提醒别抄得太明显了。”王焯说。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一些重点高校、普通院校的教改项目都涉及到应用性本科、应用性人才培养。尽管这些高校在姿态上积极转向应用性建设,然而教师观念、配套建设方面,能相应地跟上吗?

### 变味的课程

当初选择应用化学专业,国内某“985工程”高校本科生李向是冲着“应用”二字去的。经过三年的学习,他却发现应用化学专业与化学专业所要求掌握的知识并无太多区别。

“用学长的话说,研究化学领域‘相对论’的是化学,研究怎样炼油的是化工。但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人学着‘相对论’的知识,将来就业的方向却是‘炼油’。何不早就开成化工专业呢?”李向说。

在他看来,加上“应用”二字不过是高校为学生将来就业考虑,但企业看重的是学生的上手能力,并不是一个讨巧的专业名称。

不只是基础性学科在向应用性靠拢中遇到尴尬,一些本身应用性明显的专业,同样存在问题。根据第三方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调查显示,十大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的专业中包括了审计学、财政学、动物医学、会计学等。

方妍教授的广告学也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专业。她在福建一所工科为主的院校任教,“很无奈,一些原本应开成实践课的课程,如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只能按理论课程教学”。

方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高校最想要理论教学与行业经验兼备的“双师型”教师,但广告学教师绝大多数是“从校门进校门”,几乎没有行业从业经历。“我们一旦去广告公司接案子,就相当于挣外快,与学校的管理体制不符;广告公司也未必愿意接收一个理论型的兼职人员,更别说解决校外职称。这些都导致了文科教师的实践动力不足。”

既然教师走不出去,就把业内人士请进来。方妍并不是没想过。同城一所高校的广告学开设了“总监进课堂”课程,邀请了10位广告公司总监轮流讲课。方妍把类似的开课方案上报教务处,但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第一,必须得保证10个总监到课,那么教师必须先去找企业拉关系;第二,如果要开成一门课,总监就是外聘老师,但校方对外聘老师有硕士学历或讲师职称(中级职称)以上的要求,而总监们很可能两项都不符合。

方妍陷入两难境地。最后,她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把学生与广告公司的互动安排在为期一周的实践教学课上。“现在,学生们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实践教学,但还是太少了。”

### 实质是给教育质量补课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

示,传统的高校人才观是培养理论性人才,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如今的高校人才观向着应用型、复合型及拔尖创新人才转变,其中,发展应用性本科就意味着要改变人才观和课程观,必须通过课程观、课程教学能力的提高来实现转变。

眼下,一部分高校正在进行的OECD工程教育改革和教育部推行的卓越计划,希望实现由理论性课程向实践性、应用性课程转变,就是培养应用性人才的教改实验。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应用性本科建设是地方院校教育质量提升的一种“补课”形式。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指出,比较而言,重点大学教师忙着搞科研、发SCI,地方院校的教师们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如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抱着总有学生调剂过来,学生找不着工作无所谓的态度,提升教育质量永远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提升教育质量不是靠办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就能实现,目前我国大陆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得众多的地方高校提升教育质量。”

别敦荣指出,应用性本科建设的困难突出表现为课程更改后,整个教学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教师的适应性不强——教师更适应于传统的理论教学,对实践要求高、知识应用广的课程准备不足;教师的知识面有限,一人无法完成一门课程中多学科知识交叉应用的教学任务。

“然而,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由教师群体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机制受阻所造成的。”别敦荣说,一方面,一些教师到了企业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企业不敢贸然让他们顶岗实践,因此对老师的要求很难落实;另一方面,高校教师比较紧缺,没有多余的教师轮班,顶岗实践无法保障。

“应用性本科建设的困难突出表现为课程更改后,整个教学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教师的适应性不强,对实践要求高、知识应用广的课程准备不足。”

“最关键的是,高校只要求教师把课讲好了,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没有提要求。换句话说,高校只要求学生要有实践能力,并没有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有所要求,这就相当于是无源之水,学生的实践能力必然落不到实处。”别敦荣说。

### 给教师提高实践能力的通道

由于学校暂时没有应用性本科建设的具体措施,王焯决定“自谋出路”,趁着暑假到北京某报社实习。她想尽快了解报社的采编流程、新闻写作,不要再发生被学生问住的事件。但在她心中,更期待的是学校能够提供实践的机会和条件。

长江大学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据介绍,该校青年教师的岗前培训长达一年,其中半年时间在课堂上学习教育理论、教师规范、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半年时间深入与各自专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实践基地苦练“内功”。

别敦荣告诉记者,能否把教师派往企业还取决于学校与企业的关系,譬如,长江大学前身包括了江汉石油学院,它跟石油系统的关系密切。“这就要求高校与实际部门建立协同机制,没有协同机制的人才培养,教师水平、能力的提高很难真正达到目标。”

卢晓东表示,开设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很多时候要与业界形成很好的沟通协调。其中不乏灵活的做法。譬如,利用暑期学校,邀请业界人士在暑期四周内集中授课;教师还可以运用“学术休假”,在校授课4年,在公司工作1年后,再重返高校。

“在机制上,需要高校进一步创新。”卢晓东说,香港大学的一些法律实务课程通常由学校教师和行业律师共同教授,这样的模式可以引入内地的应用性课程教学中,考虑到业界人士

无法全职授课,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保持在1:1较佳。

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明文规定,作为该院教师同时要保持电影人的身份,以制片人、导演、编剧等参加电影艺术创作。在卢晓东看来,应当允许我国高校教师到业界兼职,学校作好统筹规划。例如,5个工作日内,允许教师4天在校上课,1天减一部分薪水在企业中兼职。

“此外,双师型教师的评价不能完全以学术为导向,必须将实践能力放入考核标准。”卢晓东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甚至相关专业的教师招聘可以设定一道门槛——无相关工作经验者不予考虑。

### 转型应用,切忌一拥而上

进一步说,如果高校制度通道健全,教师实践能力提升,作为应用性本科建设的主体,高校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劲头?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与教师应用性转型的“热劲头”相比,高校在本科专业设置的应用性转型上应当采取“冷处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是“高校向应用性转型”的支持者。但是,他认为,应用性教育主要应放在研究生阶段,本科教育依然要强化基础教育,起码在理科教育是如此。“本科教学并不能细分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我们希望的是本科生能多了解一些成长实践的环节。”

在别敦荣看来,开展应用性本科建设的高校必须分类,如今地方高校向应用性转型的居多,但并不是说“985工程”高校不适合作应用性建设的探索。如上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理工科高校应当旗帜鲜明地培养应用性开发人才;而像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本科阶段侧重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其应用性建设应更多地着眼于研究生阶段。

与此同时,还要警惕高校专业设置被市场牵着走的势头。在不久前公布的《2012年度教育部审批不同意设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中,高校申请的金融学、会计学、法学专业被否決的数量最多。

卢晓东表示,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些高校没有充分考虑人才饱和的问题,有时一些高校的办学力量严重不足。

“当然,大学要随着市场而动并作相应的调整,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就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但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以单一的市场为导向为主,还是存在着一定问题。”卢晓东说。他举例,感光材料专业随着胶片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了。“职业性专业与市场变化联系特别紧密,存在着与行业同时消失的风险。”

“如果高校转型建设职业性专业,尤其要下大力气做好通识教育的建设。在市场发生转变时,有了通识教育的知识准备和眼界的拓展,学生可以较容易地转向其他相关学科。单科性院校如果没有通识教育的良好师资,可以参加其他高校的暑期学校,选修通识课程来弥补,或者采取灵活的机制,聘请多校的教师建设自己的通识教育。”卢晓东说。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 中国大学评论

### 社会舆论真的不支持高考改革吗

■冰启

“社会舆论其实并不支持高考改革,请问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一位记者采访我,他说他采访了不少老师、家长和社会人士,他们都不支持高考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改革是很困难的。毕竟,离开了老百姓的支持,改革很可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我相信这位记者确实采访了不少群众,也相信群众表达了对改革的忧虑,但要谈社会舆论不支持改革,那是对现实改革的失望所带来的。更进一步说,他们不支持的“改革”,是“伪改革”和“折腾改革”。对于真正的改革,社会舆论一直热烈期待。

拿自主招生改革来说,近年来确有不少声音反对继续扩大自主招生,认为自主招生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还滋生权钱交易。但在10年前的2003年,当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时,大家是对自主招生改革充满期待的。虽然当时的自主招生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舆论相信此后改革会深入推进。

2006年,复旦和上海交大推出自主选拔实验(也被称为“预录取”改革)。两校在上海可自主选拔300名考生,这些考生获得学校的“预录取”资格后,虽然还被要求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只作为参考,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2008年,两校不但扩大了在上海的“预录取”规模,还将这一改革推到江浙。这些改革,都被认为是“渐进深化”自主招生。包括2010年出现的清华等五校的自主招生联考,也是扩大考生考试选择权的举措。

可是近年来的自主招生改革,却出现倒退。比如2011年,自主招生出现三大联考,这本来是符合改革方向的,但相关高校把联考和学校绑定,这背离了联考是社会化考试的本质;三大联考把考试时间放在同一天,这非但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还逼迫学生“三选一”;联考的内容,不是学术能力水平测试,而是与高考科目对应的学科考,这就把联考变为“小高考”。2011年,北大多名教授曾提议,将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公布复试分数线,接受学生申请,再对入国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查,结合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和大学面试考查录取学生——这正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方式,如果实行,不但把自主招生完全交给大学,把高考从资格考变为评价考,还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可遗憾的是,该设想被教育主管部门否定。

随着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者开始打退堂鼓了,在关键的环节上,不愿意进一步改革——把招生自主权全部交给学校,把考试组织权全部交给社会机构,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而是想着如何继续把这些权力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大家所见到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强调,所有参加自主招生获得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且分数必须达到一本线,这是在维护高校的权威地位;南科大、上海纽约大学等新建学校的招生,全部纳入集中录取,被安排在提前批,而不是采取像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方式。这摆明要求所有考生在高考中只能获得一张录取通知书,而不是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

这样的高考改革,显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于整体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大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对于大学来说,所谓的招生自主权,只是高考录取优惠而已,由于办学自主权缺失,学校没有清晰的办学定位,也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学生。于是所有高校的自主招生,强调的还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对于考生来说,自主招生则变为“鸡肋”,很多家长、考生觉得负担进一步增加,进而抱怨还不如不改。

社会舆论当然会反对这样的“改革”。对此,公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改革主导者,是希望引起大家反对改革的舆论的——因为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如果不改,权力自然就在行政部门手中,既得利益不会有丝毫的流失。社会舆论应该达成共识,推进真正的改革,这就是监督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放权,按照改革的正确方向,稳步推进改革。

其实,对于高考改革,我国只需把当前的高考功能从资格考——大学必须按照这一成绩、结合学生志愿集中录取——变为评价考,建立起“统一高考+自主招生+集中录取”的模式,逐渐完善自主招生,直至发展到“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就可完成改革的大业。具体操作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的一个月,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每个自主招生高校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同学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学校独立进行录取,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确认之后,没有被录取或者没有确认的学生,再填报志愿参加集中录取,就稳步推进了自主招生改革。一方面,这是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的完全自主招生,统一高考成绩也保障了基本的公平;另一方面,未完成的招生名额可通过集中录取完成,解决了资源闲置的难题。如果自主招生运作成熟,其招生规模(包括参与学校、录取名额)可进一步扩大,也可随之减少集中录取名额。

假如10年前高考改革就沿着以上路径推进,那么,到现在我国自主招生应该十分成熟了。高考改革并不像有关部门说得那么复杂,其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进真正的改革。而对于真正的改革,社会舆论从来没有放弃期待。

## 现场

# 科技与人:互动与反思并行

## ——北航举办“此在之在”数位艺术展

■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出门前一定会带手机(包括备用电池一块、移动电源)、MP3及耳机,回到家一定会打开电脑,即使没有什么事情也会在网上逛逛,无法忍受设备连接不到互联网。

站在地铁里也会不自觉地刷微博或者看电子书,偶尔抬头看一下四周,几乎所有人都在专注地盯着各自手里的那块屏幕。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清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一切越来越智能化,她却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被绑架了’,她进一步解释道:“生活在一堆看得见的数据线中,还有看不见的网络中”。

于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然后等待花瓣落在身上,“这样的耐心大概都不再有”。

这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馆,台湾艺术家曾钰涓“此在之在”数位艺术个展的现场,杨清发出的感慨。

### 科技进步带来的艺术形式

作为台湾著名策展人、数字艺术家,台湾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专任助理教授曾钰涓于1998年开始从事数字艺术创作。

数位艺术(Digital Art,大陆习惯称数字艺术),顾名思义,是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曾钰涓介绍,数字艺术家常用的有平面设计软件、数字摄影技术和电脑辅助绘画软件等。学界对数字艺术的定义并无统一标准,或侧重于创作是否采用数字技术,或侧重于人与艺术的互动。

既然与科技手段密切相关,因此,数字艺术的发展也与科技进步的脚步一路相随。在个展开幕式的讲座上,曾钰涓向观众介绍了数字艺术的发展脉络,同时展示了不同时期数字艺术

的代表作。尽管有些艺术作品的技术在目前看来显得比较简单粗糙,但是曾钰涓不时地提醒观众注意作品的创作年代,这些一般都是其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

该数位艺术展于3月29日开幕,持续约一个月,于北航两个校区展出。由北航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主办,也是北航实施“文艺赏析教育”项目的一次尝试。展览展出了曾钰涓近年来创作的数字艺术作品十余件(组)。

展出作品的呈现手法多样,如互动装置《奇米拉之歌》,影像及亚克力物件装置《移动中的风景》,表演录影记录《露希安娜的晚餐计划》,录像轮播作品展示《Let's Make Art.《你在哪里?》,以及平面作品《花园图鉴》、《Fuse》等。同时展览还以平面输出的方式展出了曾钰涓以往作品的展览场景及创作介绍。

### 人与作品的高度互动

走进展厅,杨清就觉得这和自己以往看过的展览很不同,这里有各种声音和投影,有鸟叫声,有类似小孩子的哭闹声,巨大屏幕上还有自己的投影……“而以前看过的展览,都是安安静静地”。

曾钰涓介绍,数字艺术非常注重观众与艺术品之间的知觉及意义的交流。曾钰涓自2002年开始以网络互动形式进行互动艺术创作。在展览现场介绍数字艺术时,她也一直提醒观众注意这一艺术形式中人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性。

以传统绘画为例,绘画是艺术家与所描绘对象发生互动,而后观者再通过观赏完成对作品的欣赏,交流过程一般属于静态。但对数字艺术来说,声音、动画出现在数字艺术中算是稀松

平常,有些数字艺术需要由专门的“演员”完成,甚至有时,现场观众就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杨清在展厅内看到一把椅子并坐在了上面。实际上,这是曾钰涓的博士生导师、台湾交大应用艺术研究所已故教授张恬君的作品《静心》。

杨清坐在椅子上,她和椅子一同出现在左侧墙面上的投影中,投影中还多了漫天飘洒的花瓣。有趣的是,在墙面上,这些“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在现实中被漫天雨笼罩一样,“杨清”的头发、鞋面上都沾满了花瓣。片刻后,花瓣突然全部飞回“天上”,而从始至终,杨清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作品介绍写道:作品体现的是张恬君学佛读经的悟道,就算是天雨花,仍是萦绕于心的烦恼,唯有静心抛开执著,才能抖落一身的凡尘。

### 反思“此在之在”

杨清在展厅内找到了婴儿啼哭声音的来源,它的发声装置来源于作品《奇米拉之歌》。

“奇米拉”音译自英文单词Chimera,该词有双重含义,一是神话中具狮头、山羊身体与蛇尾的喷火怪兽,今又代表基因生殖技术中的嵌合体,意指由两个不同物种的细胞组成的“马赛克”机体。工作人员向杨清介绍道,该作品以此为题,暗喻生物物种“人”已经成为有机与无机的嵌合体,人透过数字载体藉由数字资讯来建构自己的生存领域,数字工具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真实记忆与数字记忆,在虚拟与实体空间互相渗透交融。

“奇米拉”内嵌于现场的一个培养皿中。当杨清把“奇米拉”从培养皿中拔出后,失去与母体连接的“奇米拉”便会大声唱歌,直到被放回



《奇米拉之歌》互动装置

曲珊摄